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進修報告

服務機關：僑務委員會

姓名職稱：楊修璋 科長

派赴國家：英國

出國期間：100年9月13日至101年9月7日

報告日期：101年12月6日

摘要

本心得報告基本上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爲本次進修目的、進修過程（包括準備階段、進修階段及其他），以及心得及建議；第二部分爲進修期間所撰擬之學位論文，論文題目是：“中華民國海外升旗典禮之國家論述--以美國金山灣區僑界舉辦中華民國一百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爲例”，主要是探討海外僑胞國家認同形成與轉變的思考脈絡，論文的結論是在僑居地舉辦的升旗典禮，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改變其意義而與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互相嫁接鑲嵌。



目次

第一部分

進修目的.....	1
進修過程.....	2
心得與建議.....	9

第二部分

論文摘要.....	11
第一章 導論.....	12
第二章 理論背景.....	15
第三章 在臺灣的民族主義.....	25
第四章 海外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	32
第五章 結論.....	40
參考書目.....	43

第一部分

進修目的

職自學生時期即對於現代華人受到傳統文化影響而在政治運作、權威表現的特殊性即產生濃厚興趣，也對於現代國際關係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大脈絡中，華人國家--尤其是臺灣，如何調適混雜的認同，努力扮演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歷程，感到值得長期予以關注。

研究所畢業後進入了職場，自民國 87 年通過高考進入僑務委員會任職 10 餘年，經辦美國華府、紐約等地僑社聯繫業務，並於 90 年派駐邁阿密辦事處擔任僑務秘書，92 年調至駐舊金山辦事處所屬「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擔任副主任，94 年調回國，擔任機要科科長、綜合企劃科科長等職。多年於政府機關之第一線處理接觸海外華人事務，深感許多僑民雖已移居海外數十年，但仍深受國內政局牽動，對臺灣之關注、對家鄉事務的珍視，以及對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之艱困處境，感受可說更甚於國內居民。然而渠等多已取得美國國籍，亦不乏在美退休養老，不打算再回臺灣者，他們的國家認同，經過移民、工作、定居、入美國籍等歷程，是否發生轉變？如何轉變？此外，近年來國內有關國家認同的論述與臺灣人民主體意識的變化，在海外的他們，面對轉變中的家鄉，國家認同是否也隨之轉變？或是發展出調適的機制？以上種種，都係在與僑胞面對面的接觸中引發的思索，但受限於訓練不足，難以從表面現象中整理出有意義的脈絡，因此亟盼再學習進修，希望將實務上觀察到的現象與疑惑，透過嚴謹的學術訓練，提出有系統的歸納、整理，為國家認同議題提供不同面向之理解。

此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加上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在國際間引發的關注，我國與中國大陸僅一海之隔，在海外僑社間兩岸僑民各種競爭與合作，已是近年來僑務工作無法迴避的課題，一方面全球華人社群隱然興起之姿，僑務工作是否可以為我國在此一趨勢中洞燭機先，取得有利的策略位置，繼續維持我優質中華文化的競爭優勢，是在眼前即將面臨的挑戰；另一方面，兩岸中華文化間同中有異的現況，應如何務實的理解與建構，以期在現代多層次的身分認同選擇中，恰如其分地進退有據，這一點在海外僑胞所身處以及表現出的跨國異地主體特質上，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為華人移民，特別是臺灣移民

的事務，創造跳脫冷戰對抗之藍海思維的可能性，也是職亟盼透過繼續進修來取得相關議題更深刻的瞭解，並獲得啓發思考的方向。

因此先想要在這裡表達職對國家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感謝，如果沒有這樣的出國進修計畫，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地出國進修對投身職場多年的公務員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出國進修所獲得的視野、訓練、個人心智能量的鍛鍊，以及異國生活文化的衝擊與體驗，再加上進修期間對上述議題的思索、沈澱與啓發，也遠超過所取得的一紙文憑所能夠呈現的。

進修過程

職於九十九年幸獲錄取參加行政院選送具發展潛力公務人員赴國外知名大學院校進修碩士或博士學位，以提升專業知能及國際競爭力之公務員進修培訓計畫。以下謹分就準備階段、進修階段以及其他三部分分述之。

一、準備階段

由於職係參加碩士學位的進修計畫，為期一年，因此一開始即縮小範圍，排除一般需時兩年的美國研究所課程，而以碩士課程僅需一年的英國地區大學為主要學校資料收集的目標。另外大英國協地區高等教育機構所需的英文測驗成績為雅思（I E L T S）測驗，因此獲得進修機會後即開始準備雅思考試；同時與職錄取出國進修計畫的另外兩位其他部會的同仁也計畫前往英國，因此我們三人即組成英文讀書小組一起準備雅思考試，分享各方面的資訊，有人提供補習班的模擬考試講義，有人介紹部會裡的英文顧問讓大家練習口說測驗，有人分享英國文化協會的相關免費課程和考前衝刺班的資訊，參加雅思考試的費用為台幣 5,400 元左右，後來我們三人也很順利地先後取得了通過申請門檻的測驗成績。

至於申請系所所需的相關文件和費用，各校和各系所都可能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需要準備英文的畢業證書和成績單、語言測驗成績、研究計畫書、來自學術機構的推薦信二封等，少數學校要求英文的學術作品兩篇以及三封推薦信，多數學校不須申請費用，但少數學校必須繳交 35 英鎊到 50 英鎊不等的申請費。另由於職規劃赴文化人類學系所進修，經洽請英國友人提供該領域較具專長的學校以為參考，最後申請到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該校人類學

系所於英國大學排名名列第一或第二，專長於社會人類學，同時也是英國大學人類系中臺灣和中國研究的重鎮。

取得入學通知後接著就要辦理英國的學生簽證，現在由於臺灣赴英國旅遊可享有六個月免簽證待遇，所以在臺的英國文化協會已不設簽證組，所有非旅遊簽證的簽發都要送到菲律賓的英國駐馬尼拉大使館辦理，所以要準備多一點時間以免申請過程中遇到波折致耽誤到重要的期程，學生簽證的費用約為新台幣 12,500 元。另外機票也最好提早訂購，學生機票在開學前總是特別熱門，不容易訂到，最重要的是因為學生票可以托運的行李為 30 公斤，比一般旅客的 20 公斤多出不少，對於將要在英國生活一年所需攜帶的東西，額外的托運額度很有必要。

與訂機票息息相關的事就是抵達英國後的住宿問題，職在國內時並沒有申請到宿舍，僅能排在候補名單內，另外也透過學生網站收集一些找房子的網路資訊，然而倫敦地區的房價高昂令人咋舌，以每週的租金計算，一般的雅房至少是 130 英鎊起跳，套房則是輕易地上看每週 200 英鎊以上，而學校所提供的住宿須知強烈建議一定要親眼看過房子後才能決定，切勿僅憑網路照片即支付任何款項，如此一來一定得抵達英國後才能開始找房子，因此在出發前深感到充滿不確定性與壓力，經再度透過友人協助先申請到倫敦大學學生宿舍暑期開放給該校學生的短期住宿，才暫解到了英國無處落腳的燃眉之急，但還是憂心忡忡地想著到英國後要如何找房子的問題，所幸抵達英國後不久就收到通知說候補到了學校宿舍的單人套房，每週租金為 160 英鎊（據聞下一學年度又再度漲價至約 180 英鎊），住宿的問題才總算獲得解決。

二、進修階段

鑒於職的英文程度僅越過學校錄取門檻，尚不足以有餘應付學習所需之聽、說以及討論議題之表達能力，此外也對於將必須用英文撰寫學術報告一節深感經驗不足，因此職自費並使用個人休假約提前兩週赴英參加學校語言中心所開設的學術英語課程，在當中才得以稍微了解課堂書面和口頭報告的格式要求，如何引用其他的學術著作才不致造成抄襲等等，在過程中除了上述這些學術規範的指導以及學術英文聽、說、讀、寫的練習外，一直被再三強調的就是切勿抄襲他人的

作品，並且得知日後所有繳交要計算分數的報告，都會被送進一個電腦程式檢查，以嚴格杜絕抄襲。從這一點職感受到學校對於學術訓練的嚴肅態度，也看到對於從事學術研究者的培養，從踏入門的第一步開始，不僅是要求作學術研究的能力，同時也賦予學術倫理的要求。語言課程算是暖身階段，初步地已感到應付起來有些吃力，課堂上聽和說的反應總是慢半拍，和同學間的課後的互動也難以稱之為流暢，總之語言能力真的是未來一年的夢魘，無所不在地掣肘所有的情境。

開學之後課業的要求接踵而來，不過學校在給予學生適應學習方面提供了非常完備的配套措施，首先在語言中心將相近系所分門別類，開設了免費的學術英文課程，以盡量讓語言課程內容能夠跟課業內容接近，而非流於過於廣泛而缺乏主題重點的英文課，安排的老師也是相關科系畢業的，以使能夠盡量熟悉學生所可能遭遇的問題並給予協助，除此之外，語言中心也有各式各樣學習各國語言的活動，如電影欣賞或是語言交換計畫等；在研究所裡，每位學生都被分配到一位由系上教授所擔任的導師，這位導師也會是未來協助學生撰寫畢業論文的人，在學期期間學生每隔週必須與導師會面半小時，討論一篇課堂報告，換言之，每隔週必須撰寫一篇 2000 字以上的課堂報告在導師時間前繳交，導師會先加以批改，並在與學生會面時給予回饋，或是問一些在報告裡沒有表達清楚的問題，凡是在學習或是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問題都可以向導師求助。而系上每一位老師每週都有一個時段（office hour）供學生不需預約逕前往敲門拜訪要求談話，或是先寫電子郵件跟老師另外預約時間談話。職感受到系上的教授對於學生總是抱持非常專業的熱忱與耐心，並設法提供協助，同時也深感他們對於學術的熱忱態度，令人敬佩。

職分配到的導師為 Dr. Catherine Allerton，她是一位研究東南亞的人類學者，第一次繳交課堂報告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寫，怎麼樣的內容是一篇英文的課堂報告應該要呈現的，好不容易抄抄寫寫擠出 2000 字交卷，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很空，所以在交卷的電子郵件裡附帶地提出不知道該怎麼寫的問題，原以為她會在導師

時間給與一些報告結構之類的指導，結果她找了一份資料是有關如何回答問題的說明，換言之，她說明的是如何看懂題目在問什麼，題目裡隱藏的答題線索為何，這令職感受到不同的思維方式，別有一番收穫；與此同時，她也指出職的英文寫作尚可，不令她擔心會無法應付未來的課業要求。導師對職第一次繳交的課堂作業的回應猶如一記定心丸，時常在職感到遭遇很大的課業困難時用來鼓勵自己，至少可以應付得來的。

這一年所撰寫的課堂報告主題共有六則，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獲得導師正面的評價，有時導師也會表示報告沒有回答到問題，另外尚有兩篇報告是針對畢業論文題目的大綱和摘要討論。以下是論文以外的課堂書面報告的題目：

- (一) “Beliefs...are never neutral or free of the dominant patterns of social structure”
(Douglas 1966, 113) Discuss.
- (二) ‘Marxist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how a given social order is maintained, rather than with how societies change.’ Discuss.
- (三) What is ‘Theory of Mind’ and would anthropologists benefit from knowing something about it?
- (四) “To be human is not to be Everyman, it is to be a particular kind of man.”
(Geertz) Discuss.
- (五) Evaluate Wolf’s hypothesis that the Westermarck effect and instinctive attachment behaviours co-evolved in humans
- (六)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forces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ceived anthropological no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ethnographic field” and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 Discuss.

這些題目主要來自於歷年的期末考題，換言之，這些課堂書面報告也是在給學生練習期末考試的訓練，讓學生熟悉申論思維的方式。

除了每兩週一次寫英文報告的訓練之外，平日上課和研討會也是充滿挑戰，首先上課之前必須讀完指定進度，要讀的東西份量非常多，而且有些概念抽象複雜，用字也很專門，要一直查字典，所以讀得速度很慢，必須花很長的時間跟課堂讀物奮戰，雖然課堂上沒有老師會抽問，但是如果沒有唸就去上課，基本上就會聽不懂，因為會用到太多不熟悉的概念和字彙，因此每天應該要讀書的壓力頗大而且持續不斷，如果遇到要交課堂報告的那一週日子就會格外艱辛；而研討會則是另一種考驗，研討會都是由上課教授親自帶討論（據悉有些學校或科系是由博士班高年級學生帶討論），以一門必修課“人類學理論與民族誌”為例說明，全班同學被分成四個研討會在不同時段討論，老師在學期開始時會將同一研討會的同學分組，以分別負責每一週的討論主題，提出問題帶動討論，每組每學期（十週）大約會輪到負責兩次研討會，每次負責時都必須花費加倍的時間研讀指定文章，和小組成員討論要提出什麼問題來讓大家討論，即使不是負責討論的時候，也希望總能夠參與課堂討論。在這裡遭遇到的問題就是英文的聽和說了，有時候好不容易想到一個問題並找到空隙在研討會中提出來，可是老師可能不是很清楚職所表達的意思所以會加以追問確認，但是職卻無法確定老師問的是什麼意思，所以會陷入不知如何適切回應的窘境中；有時候老師和同學們討論的點跳得太快了，很難跟得上討論，等反應過來已經討論到其他的問題裡去了；有些同學講話含糊不清速度又很快還有口音，一年過去了職還是很不容易聽懂某位英國同學的英文，還有幾位印度同學和西班牙同學的口音也令職感到頗有障礙；另外是雖然職能夠參與到討論，但往往發言完畢後同學給予回應，又不太能確定同學回應的內容（有時是口音難辨，有時是說話者使用過於口語的表達方式）導致討論不意順暢.....總而言之，研討會所帶來的課業負擔和語言要求實在是這一年都持續必須克服的挑戰。

另外有些課的研討會也要求做課堂報告，同學們一般會製作投影片把當週指定閱讀的重點大綱整理出來，並配合口頭報告，職也在政治人類學和臺灣研究兩

門課中與同學合作進行英語的口頭報告。課堂口頭報告相對來說難度較低，因為只要把指定讀物（通常和同學合作一個人只需閱讀一篇文章）讀懂了然後把重點表達出來即可，不需負責後續的討論，因此相對來說英語溝通往來討論的窘境不易出現。

總之以上是職在學期間上課的情形，學校的正式的學期有三個，每學期十週，從九月到十二月是第一學期 Michaelmas Term，從次年一月到三月是第二學期 Lent Term，從四月到六月是第三學期 Summer Term，學期中間經歷聖誕節和新年假期，以及復活節假期。前兩個學期都只有上課、研討會和交課堂書面報告，所有的考試都集中在第三學期，而且基本上是百分之百考試決定成績，也就是課堂報告、上課表現、出席情形等等一切都不會計入課業成績，這樣的安排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際學生也許可以較為公平，因為尤其亞洲學生的口語和課堂表達一定都遠不及歐美的學生，也比不上印度學生，而且來自臺灣的學生也多半較不習慣在課堂上積極主動地發言或是提問；然而一切考試決定的政策也令準備考試的壓力格外增高，第三學期圖書館二十四小時開放，考試期間圖書館人滿為患，一位難求，學校為了滿足學生讀書的需要，還設計了圖書館網路訂位系統，每個人每天可以訂位六個小時，一般來說一個位子只要在尖峰時間被訂了六個小時，基本上那一天大概都可以使用了，所以考試期間職每天在圖書館待超過十個小時已是習以為常，往往讀到後來眼睛都花掉了，睡覺休息還不夠，要用熱水蒸氣熱敷眼睛才能舒緩不適。英國夏天白晝甚長，往往到晚上九點半到十點之間天色才暗下來，所以就這樣每天讀到太陽下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又去圖書館報到，這樣的日子持續近兩個月。在過程中也是壓力重重，除了一次考試決定一切的壓力之外，考試所要求的英文寫作能力也是另一個必須短時間克服的問題，雖然平常課堂作業老師已經給我們練習寫短篇的小報告，但是都有參考資料，可以有好幾天的時間來完成，而且是用打字的，然而在期末考試時要用手寫，且不可以帶任何參考資料、字典等輔助工具，而每一題的答題時間只有一小時，根據語

言課老師的建議，每一題最好可以寫八百到一千字，這對職來說根本如同天方夜譚，在平常練習寫報告的時候，職一小時大概只能生產出一百字，而且是打字的，所以拼錯字會有電腦協助修正，還可以查字典查資料等等。所以期末考對職的挑戰不僅在於要把大量的資料內容消化、整理、記憶，並且要能夠申論，還要能夠在短時間內很快速地用手寫呈現出來，不拼錯字，雖然系上老師們有說會考量國際學生的英文寫作能力，將考卷評分重點置於內容和論點，而不是寫作文的能力，但是如果錯到無法將內容表達清楚，或是來不及寫完，老師也無法寬予給分啊。所以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一股擔心自己手寫英文速度的焦急壓力也始終常伴左右，參加了語文中心的模擬考，一小時大概只能寫出四百多字，導師安排的模擬考，才寫了三百多字，導師看了考卷給的建議說答題的重點基本上有涵蓋到，可是寫得太少了，或許可以把每個點寫得再詳細一些.....總之這就是準備考試過程中沈重的處境，只能說真的很鍛鍊啊。其實考試的壓力之大是非常普遍的情況，考完之後與英國友人交換意見，朋友表示曾經看到過英國學生因為受不了考試壓力在走廊上放聲尖叫，或是更甚者有聽說考試期間想不開一躍而下的情形。從以上種種的情形觀之，英國的教育制度中，也有不少填鴨教育的成份，並非平常職所想像一般西方教育都較為自由開放；此外也並不是每所學校都完全用考試來評分，有些是完全不考試只交報告的，也有些考試和報告各佔相當分數比例的做法，完全視學校的政策而定。

本次進修最後一個部分是要寫一篇一萬字的畢業論文，字數可以略少（原則上不能少於八千字），但是絕不能超過，超過會被扣分，繳交時間為九月上旬。系上的政策是希望碩士論文是以圖書館資料為基礎寫成，不鼓勵進行田野調查，因為過去的一年中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程，有一些做田野調查的倫理守則擔心碩士生無法掌握得宜。因此寫論文的過程基本上還是在圖書館和宿舍間往返中完成。職所撰之論文主題為僑胞在海外舉行之升旗典禮中有關國家的想像，此類與國家認同相關的議題，始終為職所關注，再配合以全球化的脈絡和以僑胞為主體的活

動，結合了職在業務上的議題，因此寫來得以兼顧興趣和實務，雖然中間也遭遇到寫作瓶頸，時順時不順的情形，但總體而言，撰寫論文的階段應該是本次進修期間最無壓迫感的時候了。及時完成了論文的修改和編排，仔細計算字數切勿超過限制，點選上傳繳交，本次的學習之旅至此告一段落。

三、其他

在這一年期間，職亦與駐英國代表處保持聯繫，並於雙十國慶日前往參加國慶酒會，於元旦參加僑界舉辦之升旗典禮，得到代表處楊莒民組長以及僑委會同事鍾宇章僑務專員的關照，使得職在異地的生活能夠適應良好，專心向學。

心得與建議

首先要再次感謝行政院以及人事總處恢復辦理選送公務員出國進修並攻讀學位政策，這對於公務員培養國際觀確實有很大的助益，也是全球化的時代下政府部門必須具備的視野。職非常珍惜此次能夠放下工作一年的機會，全時地當一個學生，像海綿一樣吸收了很多有形無形的知識與養分，也了解到英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國年輕人前往的原因，除了英國先天具有優勢是講英文的環境，以及其豐富的歷史文化環境以外，在學校裡一切協助學生學習的配套措施都令人感到非常友善，包括系上的老師、圖書館員、語言中心等等；然而畢竟是一年就要完成的碩士課程，因此所有的學習都被壓縮，必須在更短的時間適應各種不熟悉的環境和習慣，達到各式各樣的要求，實在是有種填鴨的感受，也使得學習人文學科所需時間的累積和熟成無以醞釀，因此這樣速成的訓練也有一種導致了英國文憑貶值的說法。不過就職個人而言，此行可謂收穫豐富，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是有機會把長久以來關切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問題的來龍去脈仔細思考清楚，瞭解學界關切這個問題的論點，更多的部分是對全球化獲得了進一步的認識，再重回工作崗位時也觸發的新的思考方向。

至於建議的部分，希望這個好的計畫能夠持續辦理，以激勵更多公務員自我提升，不斷在專業領域中精進學習。除此之外在本案執行面的建議，都已經在人事總處范處長召開的座談會中知言具盡了。

第二部分

中華民國海外升旗典禮之國家論述--

以美國金山灣區僑界舉辦中華民國一百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為例

摘要

中華民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僑胞經常性地、定期地在其僑居地舉行升旗典禮。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呢？在這種海外的升旗典禮中，有著甚麼樣的共同體被想像中？在這篇論文裡，筆者檢視了二〇一一年在美國金山灣區所舉辦的中華民國一百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並論證該升旗典禮的儀式必須在多重脈絡下才能被適當地理解，包括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在當前世界秩序中的正當性、中華民國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國際孤立處境、中華民國賴以建國的民族主義論述等等。

當一九七〇年代中華民國遭到國際孤立，危機感促使中華民國的海外國民透過在國境以外舉行升旗典禮來宣示國家的存在，是一種家鄉政治（homeland politics）的展現；到了二〇一一年在美國金山灣區所舉行的國慶升旗典禮，仍然高度地反映了家鄉政治，呈現出當代臺灣存在兩種主要的民族主義論述，其彼此互斥及排他性，導致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始終無法獲得共識的現象。

然而歷經將近三十多年的發展，在美國金山灣區舉辦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不只反映家鄉政治，同時也鑲嵌進了美國的社會脈絡，從中華民國的民族國家儀式，變成了美國國內的文化活動之一，透過這個升旗典禮所鞏固的是其中一種在臺灣的民族主義，及其作為美國多元文化之一的美國民族主義。

在分析上，筆者呈現一種由下而上的觀點，在本論文中所分析的升旗典禮儀式中被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國家）更多的是一個多元族裔的美國，而中華民國反而被吸納進美國民族主義論述的架構中，因此可以論證美國金山灣區僑民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其意義已經隨著時間推移被嫁接進美國的社會脈絡。

第一章 導論

二〇一一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根據僑務委員會的數據資料顯示，在世界各地有超過一百場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在臺灣以外的四十三個國家和地區舉行。臺灣移民在海外舉行中華民國升旗典禮已經超過三十年，這在其他國家移民的活動屬於特例，一般鮮有移民在其他國家公開舉辦戶外的升旗典禮活動，為什麼臺灣移民會這樣做呢？

升旗典禮對民族國家中的民眾來說是一個平常又不起眼的國家儀式（Billig 1995），然而在這個典禮儀式中，往往默默地體現了這個國家的故事，以及集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Kaplan 1997）。作為民族國家的儀式，升旗典禮鞏固了在特定領土範圍內人們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共同體的想像（Anderson 1991），人們相信在這領土上的所有人在某個層面上具有共通性，如歷史、風俗、文化、語言或種族等等。一般而言，升旗典禮通常作為國家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環，並多在本國領土上舉行，而那些在海外舉行的，往往見於派駐國外的軍隊、國際學校，或是流亡政府。

古典民族主義的論述主張民族主義會促進提高特定領土疆界的國家中人們的同質性，並在該領域中排斥其他民族主義的發展，也就是排他性（Gellner 1983）。但是，如果我們研究海外的臺灣人所舉行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當中，有些可以發現超過一個民族主義的論述存在其中，換言之，參加者投射出不只一種民族情感。為了瞭解臺灣移民如何再現他們的所承載的民族主義，筆者將檢視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臺灣移民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來了解參加者心中的民族國家論述。之所以選擇美國金山灣區的升旗典禮來加以研究的原因是，該地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最早舉行海外中華民國升旗典禮的地方之一，加上該地的臺灣移民已經組成專門舉辦升旗典禮的組織，並經常性、定期地舉辦升旗典禮，因此，可以視為是一個已經發展成熟的案例。

至於如何稱呼來自臺灣的移民始終是有爭議的，因為有些人堅稱自己是 overseas Chinese，但另一些人則堅持自稱為 overseas Taiwanese。這個現象反映了在臺灣無法達成國家認同的共識，也延伸其影響到海外移民社群；然而大多數會出席中華民國升旗典禮的僑民多是來自自稱為 overseas Chinese 的那一群。但為了學術論文清楚界定研究對象的需要以及避免在英文敘述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混淆，在本論文中，筆者指稱從臺灣移民海外的華人為 overseas Taiwanese 或 ROC expatriates，在一些必要的情況下使用 overseas Chinese 時，主要是用以指稱其文化和族裔的意義。此外，在本論文的敘述中，中華民國與臺灣被混合使用，這種做法一方面反映在當代臺灣的現實情形，另一方面則是筆者視敘述的情境選用最適宜清楚表達的稱法。

以下是本論文的大綱。第二章說明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國際政治中所獲得的正當性，激起非西方文明地區政治菁英的焦慮，促使他們急切地企圖把原本生長的地方變成一個民族國家。雖然二十世紀末葉的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的主導地位和正當性，但它仍然持續作用於人們的習慣思維中，不斷地獲得自我複製並規訓著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另外，本章中也將涉及探討在全球化勞動力跨國流動的脈絡下，跨國移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議題。第三章說明當代臺灣所存在的兩種主要互相競爭的民族主義論述，以作為了解後續章節中討論到他們延伸到國家邊境以外競爭的背景，並分別闡釋這兩種民族主義所勾畫的民族國家具體內容為何。

第四章將詳細闡述二〇一一年在美國舊金山灣區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在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升旗典禮中，中華民國和美國國旗同時升起，筆者將呈現在該儀式中對民族主義由下而上的詮釋觀點以及其所傳達之共同體的意義。第五章是結論，在一九七〇年代，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的合法性出現危機時，中華民國運用其民族主義動員海外國民開始在國家疆界以外舉辦升旗典禮，以緩解其國內民族國家的危機壓力，然而經過將近四十年的實

踐，僑胞所舉辦之升旗典禮已經可以看見僑居國的民族主義論述逐漸地鑲嵌進僑胞的民族主義再現中。

第二章 理論背景

爲了能更佳地理解鑲嵌在海外僑胞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中所呈現的多層次意義，本章將分從三個層次說明有關於本議題的理論背景。首先是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也就是民族主義，在當代國際政治秩序中所取得具主導地位的正當性，以及其在後殖民國家中的實踐。透過這樣民族國家化世界的脈絡之下，如果一個政體無法成爲或被視爲一個民族國家，將引發被消滅的焦慮，這種消滅包括具體的消失或是意識形態上的正當存在。而民族主義在後殖民國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實踐中，可以看見其當代特質，也就是混雜以及無疆界性，相對於古典民族主義所強調的同質性與地理疆界限制，這正足以說明當代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都必須在重疊的脈絡中被理解。第二個層次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跨國移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問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接受其國民或是移民取得雙重國籍的制度安排展現了它的彈性與適應性(Guibernau 1997)，然而民族主義的制度性機器--國家卻仍然持續對跨國移民展現其規訓的權力。第三個層次討論升旗典禮作爲民族主義的一種儀式，同時也可以被視作是多種民族主義論述競爭的場域。

第一節 在當代民族國家的國際社會中民族主義的正當性

回顧過往，雖然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曾經強勢地主導著世界的舞台，但是最後終究隨著時間消逝成爲歷史，然而民族主義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在中南美洲逐漸萌芽後，發展到了二十世紀後半，已把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遠遠拋在背後，可以說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隱然地主導了世界近代史的發展(Anderson 1991; Billig 1995; Kelly and Kaplan 2001)，這種現象尤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格外顯著。在近幾十年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中，學者普遍認爲當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某種

建構、想像的性質(Anderson 1991; Gellner 1983; Hansen and Stepputat 2001)。當代民族國家起源於西歐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如所謂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或是工業化的需求等等，這樣的趨勢發展到了二次大戰後，在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體系下，全世界民族國家化獲得進一步具體實踐，民族國家這種西方對於理想政體之想像在全球風行，許多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獨立，在這一波獨立運動的浪潮中，非洲、亞洲的政治菁英，通常也是當地的民族主義者，往往急切地想把自己的家鄉，也許是部落或是王國等各種形式的政體，變成西方式的民族國家(Hansen and Stepputat 2001)。

在亞洲、非洲各種各樣的政體變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用以建立民族國家的西方民族主義論述往往也必須配合當地的社會歷史條件，與這些後殖民國家的社會因素彼此鑲嵌，也就是所謂的當地化或本土化。舉例而言，在西方古典民族主義的論述中，同質性和領土疆界性是兩大核心特質，然而在千里達和多貝哥（以下簡稱千里達）獨立建國的例子中，在自十五世紀以來到一九六二年宣布獨立為止，千里達經歷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殖民歷史，在其民族組成成分中存在許多異質性，包括多樣的種族、語言和文化的不同等，千里達的政治菁英為了建立一個屬於千里達的獨特民族國家，努力設法透過論述將這些異質性描繪出其共同之處以便成爲一個民族，經由創造性地以一種混血模式（Creole model）來詮釋千里達的民族主義，混血模式意指一種經過混合而成的新千里達人，在文化上已與他們祖先所來的地方，包括非洲、歐洲或是印度，不相同，每個千里達人在混血模式而言是具有同質性的，這種一定要尋求建立某種同質性的趨力並不源於、也不受限於當地的時空條件，而是可以追溯到歐洲民族主義追求同質性的意識形態趨力，換句話說，界定千里達人是屬於同一個千里達民族的判準在時、空上都是超越了千里達的國家邊界(Munasinghe 2002)。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現代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中如同霸權一般地運作著，在 Billig（1995）所著的 *Banal Nationalism* 一書中，他認為民族主義的

意識形態不知不覺地散佈穿透於世界各國國內和國際社會，並在一種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下被再強化和再複製，結果，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性限制了一般人和政治人物對國內的公民生活以及國際間國家身分認同和互動的想像和期待。

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裡，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生產出了一種霸權般的行動規範，也就是，如果甲國被乙國入侵了，丙國可以以維護民族主義原則為名來向乙國宣戰，並可被視為師出有名而振振有辭。以波灣戰爭為例，美國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理由向伊拉克宣戰，在宣戰的演說中，美國總統布希則用保衛民族主義的普世價值來作為合理的出兵海外攻打另一個國家的理由；但是如果是某國政府對其國內百姓施暴，那些犧牲的平民屠殺事件往往得不到其他國家這麼積極大力的支援(Billig 1995)。波灣戰爭的例子鮮明地說明了民族主義的國際原則在某些情況下值得國家以戰爭這種極端的手段、極昂貴的代價來加以維護。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研究指出全球化導致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弱化，這些研究著重於呈現民族國家的主權邊界被各式各樣全球化的力量穿透，無法繼續壟斷地規範各種國際間的流動，包括資金、勞動力、技術、媒體等等(Tsing 2000)。現在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不只是民族國家，還有許多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跨國移民等等，他們對特定議題發揮的影響力都可以穿透國家疆界延伸到各國的國內事務。這些全球化的現象似乎使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globalism)，或稱作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之間出現了一種緊張的關係。就這個面向而言，Ong(1999)指出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然運用國家機器規訓、管制著龐大的跨國人口，包括透過法律體系、官僚系統、邊境檢查等等，在這些議題領域中，民族國家的疆界仍然在運作並發揮著主宰、壟斷的管制力，在這些現象裡，她強調民族主義和跨國主義兩股力量間的互賴交織，而非對立競爭。而 Billig (1995)則以全球化導致了主權的妥協來說明民族主義和跨國主義兩股力量的互動，他舉出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可以干預其會員國國內的財政和經濟政策為例來說明何謂主權的妥協；但是雖然如此，Billig 仍指出各國在移民議題

政策上，仍然表達出強烈的國家疆界意識，而這正是民族主義論述的主要特色。

本節主要論述重點在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在當代的國際和國內社會終都被視為理所當然，並以一種霸權的形式規範著政府和人們，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一般普遍都認為民族國家的疆界以被各種跨國力量所穿透，然而民族主義的規訓力（diaplinary power）(Mitchell 1999)仍然隱然地宰制著各種全球化的流動。因此如果一個現代的政體不被國際社會接納為民族國家，將在其國家和社會層面都激起危機感(Weller 2000)。

第二節 跨國移民的民族主義

現代世界上的人們都被依據國籍分門別類，這正是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一種實踐，似乎意味著一個人一旦國籍被確定了，後續有關這個人的權利義務也就隨之塵埃落定，這在法律和制度的意義上隱含著一個人的特性可以用其所屬的民族國家特性來界定。然而，移民卻難以清楚地歸類究竟是屬於哪一個國家，位於一種跨邊界、跨分類的範疇，屬於民族國家規範中的異例。移民存在的歷史遠早於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比如說歷史上著名的猶太人移民的種種記載。然而隨著民族國家世界的逐漸形成和穩固，移民變成一群被關注、監看的對象，其主要原因在於移民的現象干擾了民族國家的理想狀態，也就是公民權、主權以及民族邊界的一致性(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3)。在接收移民的國家中，往往可見到對外來移民在政治忠誠和破壞文化同質性的懷疑，或是在經濟衰退時視移民搶走了工作機會而成為經濟議題的代罪羔羊，特別在九一一事件後，相關於移民在政治活動以及忠誠度的研究探討都明顯增加，這些現象都源自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而 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則視之在移民研究中所謂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其隱含的假設是過度強調一種本質主義的民族性會持續影響著移民在新國度的生活，而忽略了在移入國中移民、非移民以及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對移民生活產生的影

響。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是跨國移民數量不斷增加，也引起了許多有關移民的研究。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是研究全球化的新學術典範，也廣泛地被應用在移民研究中。一般來說，跨國主義是指非國家的行為者持續的跨國行為，而國際（international）和跨國（transnational）的差別是在於移動的形態，前者是指不論是人還是貨品，其移動是從甲國國境移動到乙國國境便告結束，以及政府行為者的行動等都被界定為是國際（Vertovec 2009），而跨國則是指持續的狀態。有許多研究以跨國主義來探討移民議題，包括跨國移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等各種主題領域。鑒於本論文的主題，本文將著重在探討移民的政治面向議題，以下將針對包括遠距民族主義（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彈性的公民概念（flexible citizenship），以及家鄉政治（homeland politics）三個面向來加以闡述。

遠距民族主義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流亡（exile）會加速民族主義的形成，而這與人們對家鄉（heimat）的觀念認知息息相關。他認為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全球興起的跨國移民潮仍是源於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其動能來自於全球勞動力市場供需，在這一波移民潮中有一個特色在於，人的流動方向是從第三世界國家流向第一世界國家，相較於早期殖民帝國時代的移民流動方向是從歐洲、北美向其他地區流動，人的移動方向是反轉過來的，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移動所產生的異地（displaced）經驗產生了認同的需要，而在以國籍（nationality）作為法律身分的國際社會脈絡中，強化了民族國家身分（national identity）比其他種類的身分更為重要的現象。對現代跨國移民來說，網路通信科技以及廉價航空的發達使得家鄉的一切都更容易取得，同時也包括移民可以更便利地參與家鄉的政治活動，這種現象即促

成遠距民族主義的發展。然而 Anderson 對於遠距民族主義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這種型式的“政治參與，移民投射了一種想像中的家鄉但是他們並不想居住在其中，這是一種沒有責任感也無法課責的政治形態（Anderson 1992:11）”。有些海外的極端主義分子扮演其祖國國內好戰的種族主義溫床，提供資源來激化其發展，當他們積極地介入家鄉的種族政治活動的同時，卻沒有真正認真的意向認為有一天他們會回到家鄉國度去生活(Anderson 1992)。

另外也有一些有關離散族裔文化（diaspora cultures）解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霸權的討論，這些離散族裔文化在移民接收國的民族同化政策中扮演一種抵抗的力量，離散族裔標榜他們遠方祖國的民族文化特質，但是卻在僑居國形成一種政治性結合，James Clifford 將這樣的現象稱之為“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anti-nationalism nationalism）”，凸顯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矛盾。排除其中極端民族主義的主張，Clifford 認為離散族裔的民族文化論述其實是一種弱者的武器，而且是一種鄉愁的表達，畢竟只有極少數的例外離散族裔真正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如以色列，絕大部份的離散族裔文化在僑居國中都屈居於一種從屬的地位(Clifford 1997)。

彈性的公民概念

從移民本身的角度來看，Aihwa Ong 引入彈性的公民概念（flexible citizenship）來說明當代移民現象中異例的主體（nomadic subject），她以香港華人取得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的現象，來說明個人和政府採用資本主義彈性積累的概念於公民權和主權，以便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累積資本和權力。那些握有多本護照的香港菁英把此舉視為一種保險措施，用以因應回歸中國之後可能會出現的意想不到的政治變化的風險，以及作為生意及旅行上的方便。在持有多本護照的實務上，這些個人所呈現的自給自足的特性恰“體現一種身分的分裂，一種是國家強制賦予的身

分以及一種個人選擇的身分，這種個人的多重身分是來自於政治的動蕩、移民以及全球市場的不斷變動（Ong 1999:2）”。在這同樣的思維下，Ong 認為也可以套用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其先祖在十九世紀移居到海外，可以視為當代異地主體（displaced subject）現象之先驅（Ong 1999）。換言之，取得多國護照是出於非常務實及自給自足的考量，相當程度上與民族特性、公民權、身分認同，以及取得任何一本護照此舉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所隱含的忠誠和歸屬意涵毫不相關。

在西方民族國家當中，” 認同-邊界-秩序（identities-borders-orders）” 這一組符合民族國家的規範觀念也正經歷著重組的衝擊。認同-邊界-秩序概念的預設是一群人身分的特質受到民族國家領土邊界所界定，而公民秩序則在該疆界中受到政府的保護與維持，其結果則會再增強該群人對自己所屬社群的認同強度，所以認同、邊界、秩序這三組觀念所界定的領域是全等（congruent）的。這民族國家的規範被具體的落實於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有關單一國籍的規定，但隨著公民權觀念的演進，歐洲議會在歐盟憲法中已明文規定父母雙方都可以傳遞各自的國籍給孩子（Faist 2001），換言之，這表示認同-邊界-秩序的概念現在被應用於雙重或是多重公民權上，並且在現代的實踐中，人的認同、國家邊界和公民秩序所界定的範圍不再是全等的，是多重的而且互相重疊，必須視社會情境來重新界定，而非單一地依地理疆界來認定，而且每個人的身分認同不再是從一而終不能改變的，而是斷裂、間歇的存在，會依當時所處的情境環境而有所不同。

跨國移民的現象侵蝕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上的主導地位，離散族裔的文化論述與民族國家文化同質性的論述間存在著緊張的矛盾關係，然而在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跨國移民潮及全球化的各種流動下，上述的緊張關係在透過雙重或多重國籍的實踐展現了民族主義的彈性，並且出現了權宜的公民概念（citizenship of convenience）（Vertovec 2009: 92）正面地回應了該緊張關係。

家鄉政治

移民會跟家鄉保持千絲萬縷的關係並非新現象也不令人意外 (Anderson 1992; Vertovec 2009)，這些聯繫隨著現代通訊科技和交通方式的發達益發獲得增強。移民參與家鄉的政治活動的種類和深度，依據相關的脈絡背景也各有不同，包括移民的歷史、家鄉和僑居國的政治情勢等等都會有影響。移民的家鄉政治影響力所及包括移民的輸出國與接收國，在移民的接收國，外來移民組成許多公民團體遊說該國政府通過有利其祖國的政策(Basch et al. 1994)；而在移民的輸出國，僑民則可透過選舉或非選舉方式參與家鄉的政治，前者包括政治捐款或是不在籍投票，後者是指透過慈善捐款或是回國投資來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Guarnizo et al. 2003)；更有甚者，有些移民積極操作家鄉政治以期望改變祖國的政治現狀、介入內戰，或是策動一些激進主義的運動等等(Vertovec 2009)。在後續的章節裡，本論文將探討家鄉政治如何以一種理所當然且不引起注意的方式在僑居國影響著臺灣移民。

第三節 民族主義的儀式

Durkheim 在一九一五年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非常有創意地採用宗教和儀式的觀點來研究現代社會，當代許多其他學者也運用宗教的角度來研究民族主義，他們討論的主題包括視民族主義為現代社會的宗教(Kapferer 1988;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同時也討論政治儀式就如同競技場，供不同的政治團體、國家論述和意識形態在其中爭逐權力的合法性(Bendix 1992; Kaplan 1995)。

升旗典禮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政治儀式，在其中民族國家的主權論述、這個社群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人們對該社群情感的連結都被讚頌、再增強以及再生產。許多當代民族主義的宏大論述都彰顯民族主義當中的菁英特質，往往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強調一種應然的規範、合法性或是民族主義對現代社會

發揮的功能，以及民族主義如何在工業社會中滲透及動員群眾的歷史(Anderson 1991; Gellner 1983; Smith 1982;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經由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群眾的民族情感會被激發以及再增強，然而對民族國家這種想像的共同體的情感必須不斷地添柴加火以維持其熱度以源源不斷地持續下去，否則這想像的情感就會被其他更具體的日常情感所取代，像是親族關係。國定假日以及相關的典禮儀式就是設計來定期地提醒、喚起群眾的民族情感，而民族主義的儀式通常都一定會置入政治的象徵元素、信仰及價值的論述在其中，並廣邀群眾參與，從而集體的情感和特定的民族社群論述就在其中被重複表達與再生產。儀式的形式通常會依照古早的典章行禮如儀，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隨著主辦人和參加者的改變，以及整個儀式的時空脈絡換置，儀式所彰顯的意義可能會逐漸地改變(Bloch 1986)。此外，如果在一個社群中有超過一種以上主要的民族國家論述競爭並且同時存在，當由非官方的行為者舉辦升旗典禮的時候，即可觀察到群眾如何再現他們被精英所灌輸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不同民族主義論述的競爭，從而呈現出一種由下而上的民族主義的再現 (Scully 2012; Verkaaik 2010)。

小結

本章回顧了二十世紀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民族主義所取得之霸權般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這是下一章的理論背景，將用來論證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繼承了清朝末年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急於將天朝中國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焦慮。本章同時也回顧了跨國移民的民族主義研究，用以了解在當前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移民如何用行動展現跨界的觀念，深深地挑戰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範，以及這些跨國的主體如何感知他們的多重的公民身分，和隨之而來的遠距民族主義議題，這些都將成為後續章節中討論中華民國海外國民從事民族主義活動的基礎。另外，升旗典禮作為民族主義的儀式是用來具體而微地讚揚民族國家的價值，該

儀式不僅鞏固，並且再生產一種情感，用以深深連結一個具有領土疆界主權以及生活在該疆界內的那一群人們；然而臺灣的僑民在海外所舉辦的升旗典禮在意識形態上卻彰顯了民族主義領土疆界性的矛盾，這個矛盾在升旗典禮的儀式安排中獲得了化解。

第三章 在臺灣的民族主義

爲了要量化臺灣居民的統獨偏好，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自一九九六年起每年會進行民調，根據二〇一〇年的民調結果，從贊成立即宣佈獨立到支持立即與中國統一之間共有七個選項，其贊成的百分比分別爲：立即宣佈臺灣獨立佔百分之 5.93；維持現狀但逐漸走向獨立佔百分之 15.47；永遠維持現狀佔百分之 27.97；維持現狀以後再看情形的佔百分之 35.83；維持現狀但逐漸走向與中國統一佔百分之 7.93；立即與中國統一佔百分之 1.47；無意見佔百分之 5.47(MAC 2010)。

這些選項來自於現在並存於臺灣的兩種民族主義論述：中國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Hsiau 2000; Hughes 1997; Yip 2004)。前者承自中國大陸是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後者則是源自有著被日本殖民歷史的臺灣社會。爲了避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張的中國民族主義造成混淆，在本論文中指稱在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爲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本章將分別闡述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來用以說明在臺灣社會中民族國家想像的組成要素，同時也會兼論及海外僑民是否被含括進這兩種民族主義的論述當中。

第一節 中華民國民族主義

在臺灣，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論述起源於中國大陸，並由先前的威權政黨--國民黨，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臺灣推展運作。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一年由孫逸仙在中國南京所創建，經由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作爲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孫逸仙設法避免中國遭殖民帝國瓜分，他以三民主義宣揚其建國理念，這也成爲中華民國執政黨合法性來源的基礎。孫逸仙所思考的民族主義非常接近 Gellner 所定義的民族主義(Hughes 1997)，也就是“國家和民族的疆界應該完全吻合”(Gellner 1983: 1)。追求一個統一的中國是中國民族主義最基本、首要的原則。

臺灣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年間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到了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才從日本手中接收臺灣，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接收臺灣四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內戰失敗撤退到臺灣，其當時的執政黨為國民黨，正面臨著即將可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的危機時刻，隨著韓戰在一九五〇年的爆發，以及後續在美、蘇兩大陣營間進行的冷戰，使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隔著臺灣海峽對峙，但情勢也穩定了下來。

承載著歷史的遺產，以及伴隨著可能被敵人消滅的危機，國民黨展開中華民國在臺灣建國的各項施政，國民黨宣稱其統治是基於遵循三民主義以及一九四六年在中國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並且宣稱終將從中國共產黨佔領中恢復中國大陸的領土。然而，經由界定為戰爭時期，國民黨在一九四八年宣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在一九四九年實施戒嚴，使得中華民國憲法的效力被暫時凍結，國民黨得以在臺灣展開其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在國際上，中華民國宣稱其政權為中國在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代表，並且以中國的身分為聯合國的會員國(Roy 2003)。

在文化方面，國民黨首先致力於驅逐日本殖民時代所遺留的影響，並壓制臺灣本土文化(Chun 1994)。推行國語政策，規定在公共場所只能講中文，在學校或媒體上不准使用日語或臺灣方言。相對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開始，國民黨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國民黨自稱是正統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者與保衛者，並在臺灣推展所謂正統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臺灣與中國在歷史、族裔與文化方面的共同性、連結與延續性 (Hsiau 2000)。

透過義務教育，中華民族的論述鋪天蓋地灌輸於臺灣的社會，有關中華文明的優美榮耀以及歷史悠久被大力讚揚，而中華民國正是這偉大傳統的繼承人；在族裔血緣方面，強調臺灣人的祖先是從中國東南沿海省分渡海移民過來的，因此大部份臺灣人的血緣是與中國漢人相同的，至於在臺灣的原住民，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的共和精神，都同屬於中華民族。儒家思想被高度推崇，鼓吹孝順父母以及社會的倫理秩序等價值；此外，透過各級學校灌輸愛國教育，每天早上全校師

生聚集舉行中華民國國旗升旗典禮，全體齊聲高唱國歌；教師們在課堂上講授中華民國建國的歷史，以及革命烈士的故事。總而言之，國民黨運用其統治的地位，獨佔詮釋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和文化，營造強調臺灣和中國的共同性，以及鞏固中華民國民族主義，這樣的論述又回過頭來再生產、再增強了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第二節 臺灣民族主義

在歷史上，臺灣在一六八三年正式被納入中國清朝的版圖，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訂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又從日本手中歸還給中國，但是是由取代清廷的中華民國政府來接收。臺灣社會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一時間頗多不適應中華民國的統治，總之陸陸續續在臺灣社會發生了不好的經驗，終於累積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出來。二二八事件肇因於警察取締販售私菸者的衝突，警方暴力的處理方式引起大規模的群眾抗議，繼之國民黨政府又以軍隊來鎮壓隨之引起的臺灣社會騷亂，並配合後續的逮捕行動。這一段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時期被視為政治禁忌禁止探討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二二八事件激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隔，同時也成為臺灣社會的集體創傷以及未來的臺灣民族主義之核心象徵(Roy 2003)。然而在事發當時，臺灣的民族主義意識還尚未產生。

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之下，臺灣的民族主義意識沒有發展的空間，並且由於國民黨強制灌輸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而更窒息了臺灣民族主義的成長機會。然而，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契機來自於國際情勢。國際間在一九七〇年代質疑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而合法的代表的質疑聲音高張起來，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中國代表的席位，這意味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嚴重地被消解，其效應包括在國際上還是國內社會。自此之後，中華民國

的邦交國一個接著一個斷交，終於到了世界上大多數的主要國家都放棄與中華民國正式的外交關係的程度，與此同時中華民國也被排拒於聯合國體系裡所有的國際組織之外。一九七八年，爲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美國也終止了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這所有的國際事件都深深地在國內外消解了中華民國作爲一個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基礎。

在國內社會，由於軍事威權領導人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過世，國民黨也放鬆了其長期對臺灣社會嚴密的控制，民間力量得以逐漸復甦。鄉土文學的盛行喚醒了臺灣的本土意識，而在地方自治理念下所舉辦的地方層次的選舉，則爲將來臺灣進一步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石。一九七九年因爲台美斷交，國民黨政府決定暫停即將舉行的地方選舉，引起了反對人士於當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在高雄聚眾抗議，史稱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在實施戒嚴的時空環境下，高雄事件仍以逮捕抗議分子並以叛亂罪起訴之作收 (Roy 2003)。高雄事件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了像是里程碑的角色，開啓了臺灣自由化的時代，同時也關鍵地促進了日後臺灣民族主義的論述。

在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氣氛增加了中華民國將被消滅的危機感，迫使國民黨進行政治民主改革以贏得西方民主體制國家的支持 (Madsen 2007; Weller 2000)。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政治上，國民黨以外的政黨民主進步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在國民黨的默許下於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成立了，一九九一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適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則在一九九六年舉行，至此，中華民國完成了從威權政體轉型成爲民主政體的過程。

臺灣的人文學者深受一九八〇年代自由開放的氣氛所鼓舞 (Hsiau 2000; Harrison 2009)，在那期間人文學者、本土作家積極發展著臺灣意識的論述，相對於國民黨所加諸在臺灣社會的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臺灣民族主義透過歷史、文化與族裔論述等面向建構起來。在歷史與文化方面，日本殖民的經驗被強調，他們認爲在該段時間中，臺灣在經濟、教育和基礎建設等方面都獲得了現代化，使得

臺灣社會被轉型成爲與中國社會非常不一樣的環境；此外，臺灣的歷史被描繪成爲一段抵抗外來統治者的歷史，包括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國民黨的統治，並由一連串的抵抗事件所組成，包括反日本殖民的抗日事件、二二八事件、高雄事件，以及種種爭取民主化的運動等，這些論述都隱含用臺灣人是外來政權的受害者的論述來呈現臺灣社群，並用以凝聚並鞏固臺灣民族主義的認同(Hsiau 2000)。

爲了要反證在中華民國民族主義中所隱含的漢族中心主義的論述，臺灣民族主義者追溯臺灣人血緣族裔的起源和組成，他們認爲來自中國沿海省份的移民大多數是單身男子，也就是俗稱的羅漢腳，許多人娶了臺灣平埔族的婦女爲妻，因此形成臺灣人族裔的獨特性，學者們重新發現平埔族的歷史，用以說明臺灣民族是由多族裔的人口所組成，而非與中國人相同的漢人社群(Hsiau 2000; Brown 2004)。上述的一切努力都是試圖解構國民黨所灌輸的臺灣和中國的共同性；此外，這樣的論述同時也滿足了另外的目的，那就是透過另一種民族的論述來正當化臺灣民族的獨特性，這樣的獨特性在民族國家的論述中是夠資格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所以也意味著在其他民族國間之間有權力來提出建立獨立民族國家這樣的主張。

這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發展的軌跡說明了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正當性霸權不只是存在在國家內部，同時也存在在國際社會間。發生在國際社會中的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危機，雖然是在國家疆界之外，也會威脅到該國政權在國內的合法性，因此一個民族國家不能只是單獨獨立的存在，而是存在“在與其他民族國家的複雜互動之間” (Giddens 1987: p.171)。

第三節 民族論述中的海外僑民

十九世紀下半頁，當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形成之際，海外華僑就已經被包含在中華民族的論述中。在一八七〇年代中期，清廷官員開始在公文書中指稱移民

到東南亞地區的中國人爲華民、華人或是華僑，這個名稱主要是強調這些移民的族裔和文化的根源和關連。當時清朝的中國正面臨來自西方的挑戰，海外華僑被家鄉情感所動員並且被期待要對祖國家鄉的經濟和科技的現代化發展提供資源，作出貢獻 (Barabantseva 2011, Duara 1998)。

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逸仙在美國夏威夷建立第一個以推翻清朝統治爲目的革命組織興中會，在鼓吹革命期間，孫逸仙在世界各地旅行向華僑募集對革命包括人力、物力、經濟的支持，他訴諸中國民族主義來喚起海外華僑與祖國的連結，鼓動華僑投入建設現代中國。因此在中華民國長期以來有一句話形容華僑與建國革命之間的關係爲華僑爲革命之母(Hughes 1997)。

在一九四六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海外僑民有被選舉權，並且在三個中央政府民意機構有代表席次，包括國民大會、立法院以及監察院。此一制度性的安排說明了海外華僑不僅被納入中華民族的論述當中，而且被具體落實在憲法、中央政府層級的制度中，此外，自一九三七年開始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組織中還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來持續耕耘海外華僑與祖國各方面的連結，包括商業、教育以及文化事務等，換句話說，海外華僑是被包括在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裡，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論述延伸超過國家疆界到達其僑居在海外的國民；回過頭來，海外華僑也自我認同這樣的民族論述，認爲自己是中華民國的海外國民，同時在需要的時後能夠被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所動員。

海外華僑在中央民意機關有代表席次，這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格外具有一種象徵意義，這意味著中華民國不僅僅是臺灣的政府。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民主化之後，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改變了中央民意機關代表的組成方式，並且取消了海外華僑的代表席次，改以用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席次把海外華僑的名額包括進來，而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名單是由在臺灣的政黨所指定的，透過這個方式，海外華僑仍然象徵性的保持在中華民國民族論述中(Hughes 1997)，但卻不再享有被明顯可見安排在法律制度上的參政權。

至於臺灣民族主義，一般而言並不清楚是否有將海外的臺灣僑民納入其論述中，因為臺灣民族主義還沒有機會做出清晰明確的民族國家論述。然而經由檢視主張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組織和活躍人士，他們多有各式各樣的海外淵源背景，有些人在臺灣威權統治時期流亡海外，另一些人則是留學生或是具備反對國民黨在臺灣統治意識的臺灣移民，這些人抱持著臺灣民族意識並主動貢獻自己力量以促成臺灣的自由化。這些具備臺灣民族意識的海外活躍人士，運用中華民國憲法有關海外僑民返國參政的制度性設計，回到臺灣參與國內的民主化運動，他們運用了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論述的制度化實踐，被整合進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但也由於臺灣民主化之後，他們可以透過制度和民主化的管道從事政治參與，導致僑居海外的臺灣民族主義者相較於在海外組織建國運動，似乎投注更多精力在臺灣內部的政黨政治競爭，因此在當前的臺灣民族主義運動中海外僑民似乎並未扮演關鍵的角色。

小結

在本章中論證了在臺灣有兩種並存的民族主義，中華民國民族主義以及臺灣民族主義，兩者彼此競爭而且互相排斥，並在本章中進一步分析兩者在臺灣社會發展的軌跡及其各自的社會歷史脈絡，以及說明兩者相依而生同時彼此競爭。此外，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期，展現出一種跨越疆界的特質，這一點不同於西方古典民族主義，認為民族的成員是居住在民族的領土內的假設。臺灣的民族主義始終是一種對國民黨威權灌輸的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反抗和回應，同時明顯具備以建國為目標的一種政治性和目的性的論述建構，它並沒有明白表達其民族論述是否將海外僑民包括在內或是排除於外，然而許多海外的臺灣民族主義者透過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論述所設計的制度平台參與了臺灣的國內政治。

第四章 海外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

由於中華民國在國際間被孤立，其海外國民扮演了一種策略性的角色，以協助中華民國維持國際上的聯繫，並試圖影響其他國家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態度（Hughes 1997）。中華民國的僑民受到國家可能要被消滅的焦慮感之驅使，以及國民黨海外黨部默示的鼓勵，中華民國的海外國民受到了民族情感的動員而開始在僑居國舉辦中華民國國旗升旗典禮，作為一種證明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方式。與此同時，由於在海外，或者說在國際間舉辦了升旗典禮，某種程度舒緩了籠罩在中華民國國家和社會上面臨亡國的焦慮和陰影。

以下將依序介紹在美國舊金山灣區中華民國海外僑民的相關背景、該地僑胞所組成的一個專門辦理中華民國升旗典禮的社團—美國金山灣區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委員會（以下簡稱升旗典禮委員會），以及他們在二〇一一年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經由這樣的介紹，本文將呈現一個由下而上的民族主義的視角，以及在這個典禮中被描繪出的想像的共同體。

第一節 美國舊金山灣區中華民國僑胞的背景說明

自一九七〇年代，當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嚴峻的挑戰之際，臺灣移民開始在美國舉辦中華民國國旗升旗典禮（以下稱升旗典禮）。一九七八年，當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的時候，一些來自中華民國的工程師和自由中國之友會的成員，在美國舊金山聖荷西市開始舉辦升旗典禮。從那時起，中華民國旅居舊金山灣區的僑胞每年都舉辦這項慶祝中華民國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慶的升旗典禮。最初兩年，升旗典禮是在聖荷西市政府廣場舉行。一九八〇年，受到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的影響，聖荷西市政府不再批准出借場地舉辦這項升旗典禮。中華民國僑民於是轉而向聖塔克拉拉郡政府申借郡政府廣場舉辦升旗典禮，至今

仍每年都在聖塔克拉拉郡政府廣場舉辦升旗典禮。這項升旗典禮原本是以任務編組的臨時組織形式在運作。二〇〇二年成立了升旗典禮委員會的組織，這標示著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在海外獲得制度化的再複製與再增強。

是哪些人在美國舊金山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呢？除了部分來自臺灣的移民之外，還有與國民黨有長期的歷史淵源，早期來自中國大陸的華僑移民後裔以及中南半島的華人移民，都參與籌備了慶祝國慶的升旗典禮。一般來說，他們多半沒有長期居住在中華民國的經驗，部分人士或許在返回中國大陸祖先的家鄉時，曾經幾次順道前往臺灣。他們的民族認同與情感是另一個有趣的議題，但限於篇幅無法在本文討論。

每一年，在美國金山灣區大約舉行近百項慶祝雙十國慶的活動。這些活動分佈在大舊金山地區，有著不同的規模與形式，包括舊金山華埠的雙十國慶大遊行、約十餘場的國慶升旗典禮、綜藝文化晚會、以及各種慶祝酒會及餐會。升旗典禮委員會主辦的升旗典禮是其中最大規模的活動之一。除此之外，所有升旗典禮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士都在臺灣居住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與其他的慶祝活動比較起來，這項升旗典禮有著正式的儀式與部分官方色彩。由於其規模與形式，足以在這個升旗典禮委員會主辦的升旗典禮中觀察到僑居於此的中華民國海外國民所抱持的主要國家論述。當然，另外有更多臺灣移民對於參與中華民國國慶活動或是政治事務等方面並不感興趣，因此本文的分析將聚焦在這項升旗典禮中的國家論述，而非含括地試圖解釋該地區的臺灣移民普遍的對民族國家的態度。

一般來說，臺灣移民大都對他們在僑居地的生活感到滿足。在舊金山灣區，大多數的臺灣移民多從事高科技業的工程師，部分人士甚至擁有自己的高科技公司並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在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代，他們自臺灣的大學畢業後，到美國深造留學，就被矽谷的工作機會所吸引（Wong 2006）。他們大多是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甚至高於中產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穩定的工作收入，是美國社會所高度接納的移民。他們擁有雙重國籍並不足為奇，同時在升旗典禮

中所展現的民族情感並非是一種極端的情緒。

第二節 升旗典禮委員會的組織及其運作

升旗典禮委員會有 60 個委員，其中 30 個是團體委員，亦即由個別在海外臺灣移民社團所組織成；另外 30 個委員是個人委員。升旗典禮委員會扮演著臺灣移民僑社在舊金山地區跨社團組織的角色。團體委員及個人委員，都接受在文化上與族裔上自認是華人的論述，他們也服膺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臺灣的領導。他們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委員們彼此選舉出任期一年的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在任期間主要須籌劃兩項大活動：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活動及元旦開國紀念升旗典禮活動。主任委員在其他時間也時常應邀代表該委員會參與臺灣僑社所舉行的各種活動。升旗典禮委員會的常態性組織及主任委員在僑社活動中的參與，揭示了在舊金山灣區臺灣僑社的認知裡，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已經形成一種理所當然一般存在形勢。

二〇一一年升旗典禮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一位來自印尼的華僑。他在印尼成長，以僑生身分到臺灣接受大學教育。中華民國政府鼓勵海外華僑「回到」祖國接受教育，大部分是高等教育。每年平均有約一萬名海外僑生到臺灣接受教育。他們大多是來自東南亞的華裔子弟。這項僑生政策再次說明了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其國民並非侷限於領土的疆域之內。這些僑生畢業後，有一部分將再度移民到其他的國家，他們在世界各地組織「留台僑生聯誼會」，並參與當地臺灣移民社團的各項活動。

參加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的人超過一千人，包括海外的臺灣僑胞、當地民選官員、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臺灣駐美外交人員）及文藝表演者。每年從四月到九月，升旗典禮委員會為了舉辦這項活動，會召開一系列的籌備會議。升旗典禮委員會必須準備各項繁重工作，包括申借場地、籌款、邀請來賓、

發行特刊、收集中華民國國慶紀念品、招募志工、設計活動節目、租借音響及舞台設備等各項籌備工作。相關經費來源包括收取會員會費、接受外界捐款及出版國慶特刊的廣告收入。由於升旗典禮委員會舉辦的活動主題是愛國活動，往往能夠得到較多的捐款。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海外華僑事務的僑務委員會亦協助該升旗典禮委員會募集像國慶汽球、貼紙及國旗等愛國活動的紀念品。

第三節 二〇一一年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

美國金山灣區僑界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通常在十月十日前的週末舉行，以便利參與者出席。典禮都在上午十點十分正式開始，以符合雙十的數字意義。此外，「十」在中華文化裏是一個吉利的數字，代表著完美、圓滿。

二〇一一年的升旗典禮是在十月九日星期六舉行，典禮在由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校友會持美國及中華民國國旗進場揭開序幕。接著由第二代華裔組成的童子軍向全體觀眾展開兩國的大國旗，之後全體在場人士演唱美國及中華民國國歌，童子軍配合國歌緩緩升起美國及中華民國國旗。升旗後的舞獅表演，除了為中華民國及美國帶來好運，亦將為全體來賓及大會帶來吉祥，主任委員及政府官員依中華文化的民俗習慣在舞獅結束後都要給獅子紅包。接著主任委員、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主要的民選官員依序致詞。之後多位當地民選的政治人物宣讀並致送了賀狀及表揚狀表示祝賀中華民國國慶。接下來是表演節目，包括民族舞蹈、國術、扇子舞、國劇等等共計十項，近年來除了由華人移民所準備的文化餘興節目之外，升旗典禮委員會也邀請了當地亞裔民族藝術團體來表演。二〇一一年邀請的是印度民族舞蹈團表演，以前也邀請過越南的表演團體。整個升旗典禮的結尾是全體合唱讚揚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梅花」及「中華民國頌」的歌曲聲中結束。

第四節 升旗典禮展現的民族主義論述

在以上的描述中，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國旗，在升旗典禮中被顯著的讚美和頌揚，這可以論證在這升旗典禮中鞏固了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以及海外臺灣移民所抱持的雙重公民身分認同。典禮中先升美國國旗和唱美國國歌，表示主其事者意識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認同-邊界-秩序原則，因此這個典禮應該依照美國國內的社會規範來進行；升美國國旗及演唱美國國歌的舉動，意味著主辦者認知到其自身美國公民身分的一種友善姿態，並且需要明白地加以表現出來。

至於邀請民選官員與政治人物出席升旗典禮亦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在中華文化的意義上，越多民選官員應邀出席升旗典禮，代表主辦者與民選官員有良好的關係，而把這樣的關係在活動中顯現出來，則令主辦者有面子。另一方面，升旗典禮也是中華民國臺灣的駐美外交人員與當地官員之間個互動的平台，這一點也被視為是升旗典禮委員會對臺灣外交工作的貢獻。

在升旗典禮的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論述是由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所界定的。主任委員在致詞中強調孫逸仙及其三民主義的教誨，並把臺灣的政治民主化歸功於孫的國家建設計畫。會場的佈置則掛滿了美國及中華民國的國旗，出席者會戴上中華民國與美國國旗花樣的兩國國旗胸章、佩戴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領帶、圍巾及恤衫。表演節目的主題是傳統的中華文化，例如國術表演及京戲等。整個升旗典禮節目在兩首合唱歌曲中結束：歌頌國花的「梅花」，及描述中國大陸江山之美，包括長江、黃河、喜馬拉雅山等，並祝願中華民國延續直到永遠的「中華民國頌」。這兩首歌的歌詞沒有一個字提到與臺灣相關的人、事、物。所有的程序都與往年以來的活動一般行禮如儀，中華民國僑胞在這個升旗典禮中達到一種民族主義的歡騰狀態。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近幾年來升旗典禮委員會邀請其他的亞裔團體來表演餘興節目。藉由這項安排，升旗典禮委員會揭示了在升旗典禮中朝向多元文化發

展的趨勢，他們在美國多元種族的社會中自我定位為亞洲族裔之一。換言之，升旗典禮委員會的活動，在美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框架下，已經完全被包含在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的秩序中(Owen 2005)。這是美國的國內秩序。從另一種角度來說，美國民族主義的論述已經被嵌入、溶合在金山灣區僑民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升旗典禮之中了。

第五節 缺席與沉默的民族主義

臺灣民族主義在上述的升旗典禮中並沒有顯現出來，而是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獨佔了整個升旗典禮，該升旗典禮沒有反映臺灣民主化之後當代臺灣人的民族國家認同。

在民族主義的意義上，臺灣民族主義的缺席與沈默源自於對臺灣這個領土之民族國家主權論述的競爭，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彼此互斥並競爭民族主義唯一合法性的獨佔地位，然而沒有一方能夠成功地有效壓制另一方；然而這兩種民族主義彼此互斥的程度在金山灣區要比在臺灣類似的活動中更為嚴重，原因是在於歷史上，國民黨的海外分部與在海外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士原本就是互不往來的，在臺灣經歷了民主化之後，在海外地區也沒有任何制度性管道來調和這兩群人長久以來的隔閡，升旗典禮委員會和其前身，與國民黨傳統上有著深遠的連結，而那些抱持臺灣民族主義理念的臺灣移民既無意識形態的動機也沒有個人情誼邀約的關係去參加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另一方面，遠距民族主義的一個特徵是，離散族裔把對民族的依附情感投射在想像的家鄉上

(Anderson 1992)，這也使得對於意識型態的競爭變成更加難以妥協或和解。

為什麼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美國民族主義在同一個典禮儀式中能夠共生並存，但是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之間卻是互斥對立的？本論文認為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美國民族主義在同一個地方能夠共生並存的原因是，美國民族

主義的論述有足夠的詮釋空間來容納升旗典禮委員會的活動，是一種多元族裔政治的元素而非具競爭性的民族主義。當然，這種對於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者的活動當作是多元文化的詮釋，並不是在美國已獲得普遍的認同，它端視各個地方政府是否對這類活動抱持一種公民、多元的理解。

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明白外顯地在升旗典禮中被頌揚，但它缺乏一種包容的形式能夠將臺灣的民主化吸納並反映在其內。海外僑胞舉辦的升旗典禮是家鄉政治的一種形式，無論如何它能夠反映家鄉政治到什麼程度，還牽涉到了包含在個別海外僑社的許多因素。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所固有的排他性，持續地與另一種具排他性的臺灣民族主義競爭國家論述的主導權。如果仔細審視在美國金山灣區的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慶升旗典禮，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中的民族主義論述展現出一種鄉愁，那是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向著它想像的家鄉所投射出的鄉愁，而那個家鄉是在二十世紀初存在於中國的中華民國。

海外的升旗典禮隨著時間推移，不知不覺地逐漸地改變了意義。在一九七〇年代，出於一種國家在國際上快要被消滅的危機感與對家鄉依附的情感，海外的升旗典禮扮演一種策略性的角色，作為在臺灣執政的國民黨用來宣發一種社會集體焦慮和受到國際打壓所產生之挫折憤怒感的出口。中華民國海外的僑民深以自己是中華民國的海外國民自居，只是不住在國家疆界之內；而他們在舉辦升旗典禮的時候國家的身分認同顯然更是中華民國國民，而非美國公民。更有甚者，當時中華民國是一個即將與美國終止外交關係的外國政府，在那個時空環境下舉辦的升旗典禮顯然有一種挑戰美國所主張的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的意涵。當然，何以美國會默許中華民國僑民能夠舉行這種含有挑戰美國民族主義秩序的活動，也必然涉及到美國國內政治勢力的角力，不過這部分超過了本文的討論主題範圍。

到了二〇一一年，海外的升旗典禮已經從最早一種遠距的民族國家宣示轉變成為當地社會中的文化慶典，更有甚者，典禮活動的主辦者已經以一種自然而然的心態，進入美國亞裔族群身分的脈絡，也就是美國國內多元族裔的秩序，這反

映在他們邀請印度裔的表演團體來參與中華民國國慶活動餘興節目演出而不感到兩者間的矛盾之處。升旗典禮這種中華民國民族主義中不起眼而平常的國家儀式已經在美國金山灣區的僑社裡舉辦了超過三十年以上，一開始舉辦時國家民族面臨的危機已逐漸退去，然而典禮儀式的形式卻一直保留了下來，然而在升旗典禮中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意義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轉變了。

小結

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的競爭延伸到國家領土之外，在二〇一一年美國金山灣區所舉辦的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當中，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的論述同時被展現出來，但卻是各有不同層次的意義，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逐漸地被轉變成為美國國內多元族裔的民族主義論述架構中的一支，這兩者並不彼此互相排斥，或是可以說兩者間可以找到一種方式並存，因此他們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共同的民族主義儀式中，而且一起被讚揚；然而對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來說，這海外的升旗典禮如同民族國家論述的競爭場域，在當中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完全地主導，並且排除了臺灣民族主義，這種現象凸顯了這兩者仍是高度具備領土疆域特質的民族主義。在升旗典禮裡所出現的民族主義共存與互斥可以視為參與者集體記憶中民族主義論述的再現。

第五章 結論

一般情況下很少見到人們在其他國家舉行自己祖國的升旗典禮，但是臺灣的移民卻定期地、且視為理所當然地長期這麼作。他們為什麼這樣呢？甚麼樣的民族主義論述在這種海外的升旗典禮中被鞏固、再生產，以及這些海外升旗典禮的參與者心中想像著甚麼樣的共同體？本論文聚焦於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僑胞舉行的海外中華民國升旗典禮，並認為必須透過多種脈絡交織觀照才能加以了解。

民族主義的正當性主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世界歷史，在其中民族主義的焦慮驅策著非西方國家的政治菁英急於將其生長的地方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凡不屬民族國家的其他政體，包括王國或是部族等，似乎都與落後、不文明、被西方強國侵略、殖民等負面形象劃上等號，孫逸仙以及其他跟隨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例子，積極地企圖將天朝中國轉變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因此當中華民國在一九七〇年代逐漸被其他國家不承認為一個民族國家時，也就是透過終止正式外交關係以及被拒絕於國際組織之外等方式傳達出國際社會不予承認的訊息，不僅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面臨危機，在國內也引起了很大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動員了中華民國在海外的國民，使他們透過在國家疆界之外舉辦升旗典禮來宣示國家的存在。而中華民國的民族情感能夠動員其國家疆界以外的國民的原因，即是以其民族主義的論述涵括了其海外國民為前提，此舉能夠事先預備好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心理使他們在適當時機被民族情感來有效動員。

海外僑胞所舉辦的升旗典禮也是一種臺灣的家鄉政治的再現。為了要更好地理解二〇一一年在美國金山灣區的那一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本文也探討了當前臺灣所並存的兩種民族主義：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並經由追溯兩者的歷史發展軌跡，分別闡述了這兩種民族主義論述中有關國家的想像。中華民國民族主義萌芽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並隨著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然而由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在臺灣社會灌輸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反而刺激導致

臺灣意識的形成以及後來發展為臺灣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彼此互斥無法共存的現象，凸顯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下，領土主權至高且唯一的特質，這同時也導致了臺灣社會中國家認同無法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下，民族國家的疆界特性已被逐漸消融，包括公民以及國籍的概念，這提供另外一個脈絡來理解這個升旗典禮。經由移民跨國界流動的特質，其所呈現的民族主義論述恰可作為觀察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互動的窗口。雖然本文所討論的臺灣移民並非屬於一九九〇年代出現的國際移民潮，然而他們關於彈性公民的概念使得他們所詮釋的民族主義恰可作為民族主義和全球化互動的例子。

在金山灣區國慶升旗典禮委員會二〇一一年所舉辦的升旗典禮中，可觀察到的不僅是一種家鄉政治的再現，同時也展現出與美國社會脈絡互相鑲嵌的現象，它從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慶升旗典禮轉變成為美國的多元文化族裔節慶活動之一。在典禮一開始，國慶委員會分別向中華民國以及美國國旗，以及在場的參與者部分重疊的雙重公民身分表達敬意，如果我們細細審視儀式的程序，又可以看見典禮的行為者實際上是承載著中華文化的主體，典禮的程序安排充分顯示了中國社會注重關係和面子的考量，而餘興節目的部分則鞏固了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有關國家的想像。然而，邀請印度裔民族舞蹈的表演的舉動，卻展現了這整個活動都被用美國民族主義論述中有關多元文化和多元族裔的理念所涵括進去了，這同時也是一種跨國移民全球化流動的效應。

儘管如此，在升旗典禮中所展現的中華民國民族主義並未同時呈現臺灣民主化的元素，充其量僅宣示了臺灣內部部分的民族主義主張，而非一種具有涵括性的、可用以鞏固以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為疆界的社群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民族論述，這種排除性同樣也是臺灣當前政治論述的一種呈現。

在升旗典禮的分析中，本文也呈現一種由下而上的視角來描繪金山灣區升旗典禮委員會的成員們心中所抱持的民族主義，在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華民國民

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可以共存的，但是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卻彼此競爭，無法同時存在。典禮中被想像的共同體與其說是中華民國，毋寧更是美國，金山灣區升旗典禮委員會如同他們三十多年前的前輩們一般繼續在中華民國的疆界以外再生產與再複製著對祖國的民族情感，然而典禮的意義卻在不知不覺中嫁接到了當地社會的脈絡當中。

參考書目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Anderson, Benedict (1992),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Wertheim Lecture of the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Amsterdam.

Barabantseva, Elena (2011), *Overseas Chinese, Eth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Basch, Linda, Glick Schiller, N. and Szanton Blanc C. (1994)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Bendix, Regina (1992) 'National sentiment in the enactment and discourse of Swiss political ritual',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4): 768-90.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Bloch, Maurice (1986) Author's précis.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Circumcision Ritual of the Merina of Madagascar', *Current Anthropology* 27(4): 349-360.

Brown, Melissa (2004).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un, A. (1994), '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s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1): 49–69.

Clifford, James (1994), 'Diasporas' in Guibernau, Montserrat and Rex, John eds. (1997)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Cambridge: Polity.

Duara, Prasenjit (1998),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nation-stat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29: 4, pp.647-670.

Durkheim, Emil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C. Cosman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iksen, Thomas Hylland (2002),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Faist, Thomas (2001), 'Dual Citizenship as Overlapping Membership', Willy Brandt Series of Working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3/0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Malmo University, Sweden.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Giddens, Anthony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Guarnizo, L.E., Portes, A. and Haller, W. (2003) 'Assimil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8 (6): 1211-48.

Guibernau, Montserrat (1997), 'Nations without states: Catalonia, a case study', in Guibernau, Montserrat and Rex, John eds.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Cambridge: Polity.

Hansen, Thomas Blom and Stepputat, Finn (2001) *States of Imagination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Postcolonial Sta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Mark (2009) 'Writing Taiwan's nationhood: Language, politics, history'. In Shih, Fang-long et al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Hobsbawm, Eric and Ranger, Terence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siau, A-C.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Hughes, Christopher (1997),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Kapferer, Bruce (1988), *Legends of People, Myths of State: Violence,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ri Lanka and Austral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ress.

Kaplan, Martha (1995) 'Blood on the Grass and Dogs Will Speak: Ritu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 in Independent Fiji', in Foster, Robert J. ed., *Nation Making: Emergent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Melane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elly, John D. and Kaplan, Martha (2001), 'N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Toward a new anthropology of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Theory*, Doc 1: 419-437.

MAC (2010), 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1329176511.pdf.

Madsen, Ri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tchell, Timothy (1999),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Steinmetz, G. ed. *State/Culture: 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unasinghe, Viranjini (2002), Nationalism in Hybrid Spaces: The Production of Impurity out of Pur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9(3): 663-692.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Owen, Diana (2005), 'American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Multiculturalism', presented at the German-American Conference, Bundeszenrale fur politische Bildung and th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Freiburg, Germany.

Roy, Denny (2003),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ully, Marc (2012) 'Whose Day Is It Anyway? St. Patrick's Day as a Conteste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and Diasporic Irishness',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2 (1): 118-135.

Smith, Anthony D. (1982),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Tsing, Anna (2000), 'The Global Situ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5(3): 327-360.

Verkaaik, Oskar (2010) 'The cachet dilemma: Ritual and agency in new Dutch nationalism',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7 (1): 69-82.

Vertovec, Steven (2009),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 Routledge.

Weller, P. Robert (2000), 'Living at the Edge: Religion,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Nation State in Taiwan', *Public Culture* 12(2): 477-498.

Wimmer, Andreas and Glick Schiller, Nina (2003),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3): 576-610.

Wong, Bernard P. (2006),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Yip, June (2004), *Envisioning Taiwan: Fiction, Cinema, and the Nation in the Cultural Imagina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